

中国戏剧出版社

洪深文集
4

中国戏剧出版社

洪深文集

4

洪深文集（四）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38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7.625 插页5

1959年6月北京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平）3,501—5,000册（精）5,001—5,500册

ISBN7—104—00028—3/1·12 定价（平）3.50元（精）4.90元

第四卷說明

本卷收入洪深同志在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专集所写的长篇序論：《現代戏剧导論》，和1947年所作专著《抗战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二者都輯有大量史料，描繪了中国話剧活动在某一阶段的輪廓，是有参考价值的。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和当时写作环境的恶劣，作者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評价未必妥切，也有不够正确之处。

此外，本卷还收輯了洪深同志历年在报刊上发表的以及未經发表过的二十六篇文章，按性質分列成四类。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中国戏剧和演出的評介；二、外国戏剧和演出的評介；三、編剧散論；四、时論、演詞和自传性的杂文等。

本卷最后还附有《洪深同志生平事略》，那是欧阳予倩同志在1955年9月1日首都各界公祭洪深同志时的演詞；又洪深主要著作类編一篇。

中国戏剧家协会

1959年5月

目 录

現代戏剧导論·····	1
抗战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	121
辱国的《王宝川》·····	262
《閻婆惜》蹦蹦戏脚本引序·····	272
民間的戏剧艺术·····	294
哀《紅梅》·····	303
《孟姜女》給我們的教訓·····	314
我們怎样迎接新疆的歌与舞·····	321
导演《法西斯細菌》自問录記·····	334
《長生殿》傳奇英譯文的引言·····	344
柏拉圖与亞理士多德的戏剧理論·····	355
希腊的悲剧·····	366
希腊的戏剧节·····	387
窃火者·····	394
論者謂易卜生非思想家·····	404
安东·契訶夫逝世五十周年紀念·····	413
《尤利烏斯·伏契克》在首都的演出·····	423

術語的解釋·····	430
戲劇的方法·····	450
“戲劇的”是什麼·····	456
編劇二十八問·····	467
電影的特性及其他·····	485
1933年的中國電影·····	514
我們是這樣戰鬥過來的·····	522
申訴幾年來的痛苦·····	527
印象的自傳·····	529
我的打鼓時期已經過了麼？·····	532
戲劇官·····	539
洪深同志生平事略·····	549
洪深主要著作類編·····	553

现代戏剧导论·



新文学运动，虽然开始在五四运动前一两年^①，但实际上它的地位与力量，是通过了反帝的五四运动，才为一般人所承认与信服的。

五四运动，发源于反帝，这一点我们是不应当忘记的。一九一四年，欧洲的帝国主义者，因为争夺商品市场与原料供给所引起的国际间的矛盾，已到了无可调和无可延缓的地步而不得不出于以暴力解决，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在八九月间爆发了。这次大战，拉长至四年之久；欧洲的几个强国如德、俄、法、英、意等，自始即都卷入，固不待言；即在美国，空想者威尔逊，原以He kept us out of War^②为号召，而获选为联任总统的，竟敌不过国内金融家与大商人的要求，翻

* 本文原系《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九集《戏剧集》的导言。——编者

①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作于六年一月。——原注

② 他曾使我们处身于战争之外。——编者

然向德奥宣战，支撑英法垂败之局，以保护美国银行借给英法政府的债款与美国工厂放给英法政府的货账了。在欧美正是自顾不暇的时候，中国与日本，因为名义上虽也是站在英法一面的参战者而究竟并未曾十分出力的原故，多少地获到一点“渔人之利”。在日本，所占到的便宜是两重的：政府方面，用武力与机诈的手腕，从中国攫去巨大的利益；经济方面，由于战时世界各处商品的缺乏，日本工商业乘时兴起，一日千里。在中国呢，虽然那一时期的政治，恶劣到了极点，但也由于市场上商品的缺乏，以及银贵金贱，机器进口，值价低小的原故，新的工商业亦一时大为发达——中国的几个大的纱厂、面粉厂、卷烟厂、水泥厂，甚至进出口商行、银行等，差不多都在欧战起后，与欧战后的两三年内创办的。——新的金融家、企业家，开始认识他们自己的力量了。

关于这一个见解，我们有更加详细地说明的必要。民国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无理的要求，当时秉政的袁世凯，以为中国兵力不堪一战，采用了延缓磋商应付方策。费尽了心计，仅仅把那日本根本不想中国接受，提出来专为威吓中国以及作为讨价还价的条件，并且在日本通告英法诸国时故意隐瞒了的第五号中强迫中国聘用日本顾问以及强迫中国专购日本军械等等五个要求，办到了无须立即承认，“日后另行协商”的局面，其余的要求，差不多是全部接受了。这本是极大的失败；但袁氏受了左右如曹、陆辈底蒙蔽，过信陆宗輿五月七日婉劝其接受通牒的电报中“日本各界见此公表，众论哗然；各报且有昨日中国之让步，有

过通牒之说；群攻外交失败，政府甚狼狈”数语，又惑于一二不负责任之日人到我国使署前大呼“支那外交大胜利万岁”等意气行动，与一时中外报纸上幽默的“项城为外交人杰”一类谰词，竟而得意忘形，自以为真获胜利而加强了他底帝制自为的野心了。所以五月九日才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八月中筹安会即行出现。那时候，袁氏的估计，对于武力，觉得他底军队，比在民国二年打败二次革命时，更为可靠；对于外交，以为欧美既无暇干涉，而“民四条约既订，日本已告满意，不致再有重大问题发生”^①；所见缺者，金钱而已；于是不惜一切，决意进行。国际大借款如民二的善后借款做他底销毁革命势力的资本的，此刻既不可能，便想以中交两银行的钞票停止兑现的方法，以收取国内的现金。可是他底计划才一开始，即受到了各方面的打击；而上海中国银行总理宋汉章领导着南方的金融家对袁反抗，拒绝他底钞票停兑的命令，打破了他的收刮现金的政策，确实也是致命伤之一。袁氏终于不能不取消帝位，并忧郁以死。这一次是中国的资本势力，第一次公然地攻打中国的封建势力，而明白地显出它的力量，虽然这力量还未见雄厚；虽然攻击的方式，也还是消极的。

此后的两三年中，日本在竭力地整理和巩固它已经获得的胜利；它的用武力压迫中国接受与签字的民四条约，如果更经一次中国的“欣然同意”，那诚然是再好没有的了。所以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六十章及第七卷六十一章。

——原注

日本一方面高唱着“亲善”、“提携”等好听的口号，一方面便在喂给中国以好吃的“糖饴”——西原和其他的人所介绍或经手的借款，总数在两万万万元以上，而大都利息不高，不要求切实的抵押品，不严格地监视用途，换句话说，是一种政治手腕的“贿赂”而已；又，民国六年，日本居然接受那从前它已经几次三番拒绝过的中国派遣大使赴日呈递大勋章的提议，也无非是一种政治手腕的“赏脸”而已——这个政策，抓住了中国当局底弱点，结果是很快地就获得了实效；民国七年，中国果真地“欣然同意”，关于山东问题，与日本换文订约了^①。这种逆取顺守的方法，是非常聪明的，不妨再来一次！

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中国当局和日本的种种交接，是在秘密或半秘密中进行的，既无从完全明瞭它们的内容，更一时看不清它们的意义，只笼统地觉得，如果不是当事人可以于中取利，似乎没有这样急急地和敌人亲善的必要。而曹、陆、章这些人呢，在袁氏底镇慑和指挥之下，或者还是几个“可供奔走”的干才，不致十分地妄为；可是，遇着了寡断的段总理和无骨的徐世昌，他们竟变成中日外交的唯一的领导者了。他们的错误，是在认定日本的势力，将来可以压倒一切。曹汝霖在民国四年五月十日写给驻日公使陆宗舆的信里说：“将来欧战告终，无论胜败属于何方，日本之乘时崛起，则可断言！”他们抱了这种信仰，自然地对于美国因为参加欧战而特兴的势力，会得盲目；对于那些和他们同时担当外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十八章。——原注

交责任而和日本素无渊源的人，会得轻视；对于国内的批评他们、攻击他们而手无寸铁的人，会得鄙夷到不去计较的了。从民国五年至民国七年，他们处处都在做着日本的工具；卖国与否，纵然无直接的证据，而误国的事实，是百辞莫辩的了！到了八年四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因英法先已与日本有了密约，事实上不能阻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利的时候，以民国七年的中国“欣然同意”与日本订约为借口，隐隐地说是中国自己弄糟，中国人民自然地要怪到那些在七年和日本订约的主持人了。于是发生五月四日的示威运动。那时曹、陆等还不甘服，仗着徐世昌本是和他们混在一起分羹染指的一个人，五月五日曹汝霖上大总统辞呈，还提起这种事实为要挟。一则说：“卷查二十一条要挟事件……经过事实，我大总统在国务卿任内，知之甚详。”再说：“至于济顺、高徐各路借款，汝霖此时兼长财政，适逢我大总统就职之初，政费事储，罗掘罄尽，危疑震撼，关系匪轻；而欧美各国战事方酣，无力接济；汝霖仰屋旁皇，点金乏术，因与日本资本家商订济顺等路借款预备合同”云云；以致徐世昌内心不安，不准曹、陆、章等辞职。后来经过一个月之久，上海的工商界，明白地援助那示威的学生了，徐政府方才软化。蒋坚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第八章里说：

学生被捕后，形势益趋严重。各校皆组织演讲团出外演讲，并查焚日货，且上书大总统，请罢免曹、陆、章三人，政府不允。北京学生联合会，遂于五月二十日宣布总罢课。各地闻风响应；天津、济南、上海、保定、杭州、武昌、安庆、开封等各大城市之学校，至五月

底，几乎全行罢课。六月四日，上海学生会要求上海工商界协助；工商界即于翌日举行大规模之罢工罢市。北京政府不得已，遂于六月六日开始释被捕学生，寻将曹汝霖等罢免！

所以，就五四反帝运动而言，是获到了上海工商界底协助之后，才能贯彻主张的。就中国的资本势力打击封建势力而言，这已经是第二次；有过民四的反袁的胜利，他们这一次的和知识分子合作，才会使得军阀官僚们，不能不担忧，不能不震惧。就那整个的从民六开始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而言，在先只仅引起几个富有封建意识的文人的骇怪，未曾为一般人所关心；经过这次反帝的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才传达到更广大的民众，至少是深入了都市中的市民层——理解与同情它的人，日见增多；其余的，纵然对于这个运动底若干目标未能同意，但都能无言地尊重这个运动，并且浑茫地觉得有类此的一种运动的必要了！

二

为什么在五四时代，中国的资本势力，能和知识分子合作呢？这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那时的工商界，正想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路。而且因为欧战中间与欧战刚毕时种种环境的有利——如市场上制造品的缺乏，和输入机器价格的低廉等——他们小试一下，已经获到很好的成绩了。他们在通商口岸和外国人多年的接触，使得他们认清，帝国主义者决不愿中国工业的生长，而是在“用尽一切力量阻碍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的”。至如民四所提二十一条中第三号关于汉冶萍的两个要求，更是具体地表现出帝国主义的资本家能怎样地利用国家的武力来压制中国商人，真使他们不寒而栗。现在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运动，既然有反帝的意义，便是于他们有利益的；这是可以合作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他们把新文化运动中的批评旧道德，怀疑孔教，废除文言，破坏一切偶像等反封建举动，看作是“维新”、“开明”、“致中国于富强”的一种手腕。他们在黑暗的封建势力之下——军阀的暴行与苛税，官吏的贪污，人民的愚昧，使得他们有许多生意不能做，许多大财不能发——苦头是吃够的了。即使那帝国主义者不在“极力扶持中国封建势力”^①，用它来作压制中国资本家的工具，他们也早感到封建势力的对于他们发展的不便了，可巧，那时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在政治方面，是主张“解除个人的束缚，使人人能够参加”的德谟克拉西；知识方面，是那“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基础”的赛恩斯的方法；经济方面，是主张放任，“听其做去”，“听其过去”，“发挥个人的智力”的自由竞争——是那可以打破封建势力底枷锁与束缚的个人主义^②。这于中国的资本势力，又是有极大的利益的。纵然“非君师”，“覆孔孟”，“铲伦常”，说来有些使人惴惴；但是，离开他们底事业还远，不见得就会发生直接的危险，所以便勉强容存了。

①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十三章。——原注

② 《文化建设》第一卷第七期叶青《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讨论》。——原注

这是可以合作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新文化运动初起的时候，态度十分激进，和旧有的制度势力思想，绝对的不妥协不调和，而是谋彻底的推翻，彻底的改造的。这个，不但使得那封建意识者要把它看成“洪水猛兽”，就是一部分同情于民主政治与科学的人，也感到它的“过激性”与“危险性”的。但是，民国八年十一月，在上海的工商界援助学生运动的五个月之后，胡适发表了一篇《新思潮的意义》，主张缓进的批判，研究，与改良，而不主张突进的革命；他底结论是：“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拢统解放，改造也不是拢统改造……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到了民国九年四月，胡适又发表了一篇《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说明他不赞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对于家庭，婚姻，男女，财产等等绝大的问题早已有武断的解决”；他又说，“最好是许团员私有财产”；又，“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团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学问的方法”。这种议论，总算比较稳健的；而他们一向又认定胡适是新文化运动底重要领导人之一的；于是对于新文化运动底过激危险的感觉，无形中也消除一部分了。这是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渐渐的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的原因。

所谓“致中国于富强”，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未尝不包含着这个意义的。那时政治的腐败，军阀的横行，真有

些像十九世纪美国诗人James Russell Lowell^①所说的“为了流氓的利益，使得愚民吃亏的浑蛋政治”Kakistocracy了！当时很多人是这样想着，“中国政治不好，社会不好，眼见得国就要亡了，青年学子，非研究新学，改革旧污，不足以救亡。”所以陈独秀在民国七年七月号《新青年》《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篇里说，“有人说……现在何必谈甚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说错了……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至于那时的胡适，从他的《藏晖室札记》看来，确然也是一个“近代的爱国主义者，竭力主张用欧西学术思想来振兴自己”……的^②。中国的不能抵抗外侮，由于中国政治的腐败；所以反帝和反腐败政治，也可以说是一件事。他们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最初确是在“救亡自强底形式之下而进的”。

可是，中国的政治，为什么会得这样腐败呢？简单的回答一句，中国的人民，受到封建势力的束缚实在太严太久了，“民智未开，民权未伸”。要改善中国的政治，必须从推翻封建势力所寄托的思想、制度、文化做起。所以陈独秀说，“破坏！破坏！破坏虚伪的偶像……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

① 罗厄尔（1819—1891），美国诗人、文艺批评家及外交家。——编者

② 叶青《胡适批判》下卷。——原注

应该破坏”^①。他又在《文学革命论》里说，“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胡适更说得具体一点，“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一）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二）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三）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②又，“这种批评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我们随便翻开这两三年以来的新杂志与报纸……在研究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一）孔教问题，（二）文学革命问题，（三）国语统一问题，（四）女子解放问题，（五）贞操问题，（六）礼教问题，（七）教育改良问题，（八）婚姻问题，（九）父子问题，（十）戏剧改良问题……等等。在输入学理一方面，我们可

① 《新青年》五卷二号。——原注

② 《新思潮的意义》第一节。——原注

以指出《新青年》……等等杂志所介绍的种种西洋新学说”^①，又，“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的。^②

三

要做批评与介绍的工作，当然须要一种清楚、准确，而容易传达那工作者底意思、情感、理论等的工具。而那时候现成有的工具是有很大的欠缺的；于是便不得不从事于工具的修整与创造了。一部分人想着改革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的本身；提出如注音字母，罗马字母拼音，世界语等问题。又一部分人想利用中国原有的汉字，但改善汉字的使用法；提出如国语文法、标点、白话文等问题。另有一部分人，想更进一层，利用白话文，创作出白话文学；使得它成为那教育、领导、组织中国人“在心理上情感上反封建”的工具；提出如白话文学，革命文学等问题。

关于第一类的问题，我们暂时不谈。至于提倡语体文这件事，却是由来很久了。梁启超在戊戌变政后，亡命到日本办报，即创出一种“新文体”，不但是“时杂以俚语、韵语及

① 《新思潮的意义》第二节。——原注

② 胡适《人权论集》。——原注